

文化主体性话语： 核心命题与实践路径*

罗家旺

[摘要] 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若要在跨文化领域中不断拓展叙事空间、汇聚中华文化力量，核心命题应当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文化主体性意识的重要载体，是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面向世界增强话语魅力，将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嬗变的精神内核、意义体系，自主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 文化主体性话语 中国自主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命题，为新时代如何肩负文化使命，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指明了方向。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在融入全球化浪潮历史进程中，始终持有的中华文化立场，保有文化上的主动选择，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主体性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上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理论视域和出场逻辑。马克思强调“一门科学提出的

*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研究”（FJ2024MJDZ008）、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侨大学基地项目“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24XZXND009）”的阶段性成果。

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文化主体性若要从一种蕴含蓬勃生命的理论形态跃升为强大的实践伟力，就要依托一定的语言载体，形成文化主体性话语。

所谓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指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文化独特性、自主性的自觉表达。它关注的是文化主体如何表达自我，并维护自身价值认同，强调话语构建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从总体来看，文化主体性话语属于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范畴，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强调用中国思维组织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言语表达系统，突出话语内容创新和形式表达；文化主体性话语则聚焦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和精神独立，具有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主体能动性。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新时代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在跨文化交流中，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命题。

一、主体性内涵与文化主体性出场逻辑

马克思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②。语言并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不断提炼、总结、完善中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学理性和实践性特征。探讨文化主体性话语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体性”内涵的理解与把握，文化主体性话语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西方主体性理念的批判性扬弃基础上形成的，是唯物史观实践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体现。

（一）主体性内涵辨析

在现代西方哲学语境中，“主体性是人”已达成共识，但“人”为什么具有主体性却经过了漫长的理论求索。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一切思想活动不能脱离思想者本人存在，理性是人的天赋观念，它规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培根、洛克等经验论者则反对“理性”源于“天赋”，认为它们只能源于持续不断的观察积累。康德试图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将主体性奠定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之上，康德认为“主体性”突出表现在感官经验以符合人的主观认识结构的形式进入主体视域。由于康德过分强调主观认识结构的先天决定作用，客观对象在事实上就蜕化为被宰制的对象，这导致他的主体性思想容易滑向普遍主义和独断主义深渊。

黑格尔意识到，对人的主体力量的无限拔高，会加剧产生环境恶化、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等现代性难题。在他看来，“主体性”应重新皈依到普遍法则统治之下——绝对精神，只有绝对精神才能将人的主体性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即便如此，黑格尔仍然没有解决“主体性”的来源问题，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把主体性建立在绝对精神之下，只会助长人类的理性自负。在他看来，主体性源于人是一种感性存在，“感性”规定了人的社会历史性，“但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①。费尔巴哈开启的从物质存在视角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但马克思很快就发现费尔巴哈思想中存在的缺陷。由于费尔巴哈只是直观地去理解人的存在，他的唯物主义也只能片面地揭示人的主体性问题，未能深入社会关系去发现人的现实性，“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②，费尔巴哈这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仍然只是在观念、思维层面进行思辨，本质上没有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其一，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实践主体性。黑格尔与费尔巴哈都没有看到实践在确定人的主体性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实践不仅可以延续人的生命，更能够生产社会关系。马克思将人从生命个体迈向家庭关系进而走向社会共同体的一系列过程，归结为实践（生产）活动推动的结果，批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会无限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消解主

① [德] 费尔巴哈：《哲学短篇集》，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体的历史全貌，进而引发人与自然、社会乃至他者的全面对立，“就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①。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性。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外部世界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存在，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本质上是感性关系的对象性，即将人的主体性置于与对象性的共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直接、客观存在式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提出“人是对象性活动”的重大命题，“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②，人们通过对象性活动使人在自然面前不再是被动的受动者，人同自然之间是自我与自我本质对象化的互证关系。

其三，人的主体性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崇高使命。人的解放是哲学家们理论思考的一个根本主题。黑格尔认为，国家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也是其内在目的性，只有国家才能真正保护人们的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但由于黑格尔的国家本质上是绝对精神的投影，人的解放活动最后又蜕变到神秘精神领域。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这一理论弊端，提出双重解放路径：首先，国家要从宗教（包括绝对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神权国家变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其次，应进一步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实践改造，从而彻底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就需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③。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社会制度，才能充分保障人们的自由，尊重每个人作为主体的存在。

（二）文化主体性的出场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是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对象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关系，并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崇高使命的自主活动能力。审视人的主体性只能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活动及现实生存境遇中进行考察。文化主体性作为新时代党带领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

首先，关注人的发展问题是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立场。“为什么人服务”既是文化建设工程的首要问题，也是其基本立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中立概念，它总是或深或浅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维护和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了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文化发展的人民性就守住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线，保证我国文化发展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文化主体性只有深植人民沃土，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己任，才能得到人民拥护，人民才能以更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文化自信自强。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②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③。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自我认知、文化独立的重要表现，是国家繁荣的文化根本。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与国家实力显著提高密切相关，当国力衰败、民族羸弱、人民蒙难时，文化主体性意识只能包裹在民族求生这一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之下，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被动之举。当国力昌盛、文化繁荣、人民幸福时，人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继续推动文明传承和文化创新活动，文化主体性意识就会爆发出蓬勃力量，成为提升民族自信、增进国家认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主动之举。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强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孕育地、实践转化地，我们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正是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具体要求。

最后，增强文明交流互鉴是文化主体性的鲜明品格。所谓理论品格是指理论展现的品质与风格，它不仅在理论场中影响他者对该理论的评价，还预示处在思想交锋中理论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文化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生活的群体往往镌刻着特定的文化气质、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些成为人们了解文化形态，把握文化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与资本主义将主体性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上不同，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发轫于中华大地，强调要把文化发展的主动权、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据本民族历史条件和现实需求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热爱和平、兼容并蓄胸怀著称于世，“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古训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等理想社会的真实写照。从世界角度来看，文化主体性始终尊重各民族在长期交融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形态，是站在人类文明自我肯定的高度上充分认识“他者”文明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上提出来的。文化主体性超越了文化形态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反映的是“主体间性”的文化共处问题。文化主体性是在国内外文化实践的不断形成、演变、发展中建立的，共同铸就倡导多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品格。

文化主体性的出场逻辑表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建与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一脉相承，即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文化建设活动。这就为如何深入理解文化主体性内涵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视域。从内在规定来看，必须从价值立场、实践旨趣等确定文化主体性的应

^①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用条件，防止盲目堆砌概念、抽象嫁接理论。从外部应用场景来看，必须关注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这种内外交织的理论形态，决定把握文化主体性既不能一味醉心于文化概念解读，以激进的理论构建指导文化建设在单一实践场景中狂飙突进，亦不能为了顺从全球化而盲目拥抱全球文化，甚至为了彰显文化包容性自降身位。面对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张力，重要任务是借助全球文化的交往机制和传播平台，使本土文化理念、文化创新实践提升为具有普遍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如何将本土充沛的文化资源、文化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信意识，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及、可说的文化形态？以此构建一种有助于在跨文化交往中拓展叙事空间，使内隐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得到有效彰显。

二、文化主体性话语：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命题

文化主体性话语不是文化主体性与话语体系构建的简单加和，而是强调要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自省构建自主话语体系。这里不仅蕴含着“话语”的技术性建构，更突出话语主体的立场、态度和偏好，表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场。

文化主体性话语体现在我们要打破“表述他者化”的认识困境，要在全球文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中国重构自己主体叙事的内在要求。没有独立、自主和完整的话语体系，便很难形成基于文化主体性的知识生产，更无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实践领域的改革成就转化为叙事层面的话语表达。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文化主体性意识的伟大觉醒，使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在中国场域获得了既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异又能通达未来发展道路的自我确认，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话语体系奠定更为牢固的文化叙事基础。

（一）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文化主体性意识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人的意识活动与语言活动密不可分，语言能够反观人类思维的形成过程，割裂语言与意识的关系，不仅无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体认主体的思想动机，还会因与主体认识框架脱钩，陷入自我独白。语言与意识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语言与意识都是客观实践活动，是人们生产实践在思维和语言领域的客观反映；其二，语言和意识互为表里，意识是人的思维活动，人的思维过程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逻辑背后是认知体系、思维方式，反映人类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思考过程；其三，语言和意识都不是静止的，会与时俱进更新自身形式和内容。这表明，语言与意识不是先天关系，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匹配、修改、磨合并逐渐适应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只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才能准确传递思想、表达情感。

文化主体性意识是经过反复摸索、探索实践才找到与之匹配的话语体系，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文化主体性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近代中国来说，在西方列强侵略之下，小农经济趋于解体，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体系遭到破坏，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来自各方面质疑和批判，中国人的精神随之陷入困顿和迷茫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终极问题。鸦片战争后，在“师夷”的历史惯性中，中国人虽然在器物 and 制度层面努力向西方学习，但都不足以救国，最后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救国之路。这是中国人经过审慎选择后的一条重要出路。就文化方面来说，必须立足中国本位把握文化发展方向，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跟从，但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立足文化本位。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如果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误入歧途，就容易滑向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中国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立足文化本位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由被动转为主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找到了传承文化的正确路径，并创造了丰硕的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思想之花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之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百年历史进程中辉煌上演。中国共产党人正自觉将文化主体性意识自主转化为对外传播理念，形成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当代中国而言，构建一种与文化主体性相适应的话语体系也非常紧迫。就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升国民素质而言，文化主体性话语能够将优秀文化元素转化为具体的语言形态，帮助人们清扫文化盲点、纠正错误文化观念，使人们在良好文化生态中增强文化自信；就推动社会发展而言，文化主体性话语通过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形式，促进不同群体实现有意义的信息共享，增强文化发展的心理预期，以强劲的文化凝聚力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屹立不倒，正是通过口耳相传、著书立说、言传身教等方式，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为民族生存铸就强大且持久的发展韧性。

（二）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是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精神生产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所谓精神生产是建立在人类脑力劳动创造基础之上并且表现出各种精神性价值的活动，包括关于人类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驱动精神生产的直接动因是社会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空前精细，人类精神生产活动获得巨大发展。

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重要形式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受到分工影响，形成文化生产的专业化倾向，即专家、社会精英垄断文化生产的内容和规模。然而，精神生产归根到底受到物质生产方式制约。当阶级矛盾激化，这种由分工引起的专业性生产活动，会迅速凝聚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辩护的强大精神力量。精神生产是一项极富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输出活动，文化生产是其表现形式，主要任务是生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观念。

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精神生产活动是一种隐秘且杀伤力更强的精神压制。无产阶级缺乏掌握精神生产的物质条件，只能被迫退居到纯粹的物质生产领域，而脑力劳动则由一群被统治阶级豢养和扶持的思想家承担。当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系统性危机，资本家便会寻求与精神生产者（专家、学者等群体）合作，利用其“专业知识”“独到经验”为自身统治合法性辩护，无产阶级只能屈居在这些精神操控和“共谋”之下被迫接受现实不公。由于这些“神话”扭曲了现实利益，思想家们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产的只是一种神秘、抽象、离具体利益较远的精神产品，以便使“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会生产出脱离现实生活生产的虚幻产品。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这种精神生产方式又被移植到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为强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利益，他们自诩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如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价值观、制度、政策等方面全方位向西方靠拢。在他们看来，除了西方文明，其他任何地方性文化都是野蛮且不成熟的，通过以贬低—丑化—西化等文化递进逻辑方式消解地域内涵，加强对他国文化殖民。以中国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人把中国人丑化为“野蛮的黄种人”，宣扬东西方文明“流同源异”之说，诱导中国放弃中华文明并投向西方文明。这种系统性文化输出不仅为肆意侵略、践踏他国文化进行了合法化背书，就连被殖民国家也因长期浸润在强势话语中而心生自卑，文化主体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侵蚀之下趋于解体。

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由地方经验走向世界历史，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复制和延续，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要将殖民地国家置于与无产阶级类似境地的统治惯性使然，只有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关系的本质，被殖民国家才能在文明共存中找到立足点。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作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扬弃，是以无产阶级支配精神生产全过程为前提，主张把人的真实价值归还于人，鼓励人们激发天赋和才能。它拒斥从某种片面、抽象、狭隘的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强调精神生产的历史性、实践性和独特性。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各国各民族在文明互学互鉴中发展自身文化，反对个别强国依托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实力，向弱国推行文化霸权。构建一套彰显文化主体性的话语体系，既是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剥削本质，全面自主解读非西方文明景观、重申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三）文化主体性话语是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①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经过民族语言的洗礼才能为这个民族真正掌握。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要从文化视角切入，逐渐构建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且产生持久广泛影响力的叙事体系。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内外两方面冲击：对外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趋于解体。强势西方文化无论在价值观、知识体系还是具体文化理念上都与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存在较大区别，这使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时难以提出有效应对之策。冯天瑜指出，“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西方出现一个‘时间差’……因此，近代文化的生成期，中国比西方短促，而生之急骤，必成之单薄，需要后人加倍努力”^②。以忠孝仁义信为核心的传统理念，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族家规制度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趋于解体。对内来看，中华传统话语体系日渐式微。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发展，早已在文学、哲学、宗教、医学、科学等领域形成了自己一套自主话语体系，文学方面，中国文学是世界三大文学理论体系之一；哲学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种流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体系；医学方面，中医学与古希腊罗马医学、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阿拉伯医学并称为世界五大传统医学。这些延绵数千年发展起来的科学成就，彰显出中国人的非凡洞察力、精神追求，反映中国人表达外部世界时的深层逻辑。然而，在西方知识霸权和文化殖民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奉西方话语体系为主臬，鼓吹西方模式唯一论，用西方学术标准和话语体系衡量、评判中国现象，阻碍了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构建面对的另一层危机则表现在中华传统文论叙事风格的解体。所谓中华传统文论是指古代中国人对文学创作、批评和鉴赏的理论和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审美追求。传统文论不仅在古代文学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历史、绘画、音乐、数学、医学等创作过程也影响甚大，在古人看来，一部优秀作品既要注重思想的创造性还要兼顾语言表达的审美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8-209页。

^② 冯天瑜：《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页。

旨趣。除此以外，中国人还侧重话语表述方式的诗性追求，重中和兼济，重生命化批评，重形象化概念（感悟式、印象式的词语；喻式性的概念），重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①。中华传统文论是中国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叙述形式，承载记录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展示传统文化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这套叙事表达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曾一同被视为落后事物，各种西方语汇及其表达习惯却成为人们追捧的“新宠”。表面看来，这些只是表达方式的转换，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立场的转变，是西方文明优越论隐喻在叙事风格中的呈现。

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既要从历史的深度研判民族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侵蚀之下出现的整体性转向，又要从用语习惯、思维方式上捕捉语言结构发生的精妙变化，而这一切都要牢牢坚守文化主体性，自觉从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氛围和语言环境中提炼真理、价值和智慧，不断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自主阐释、自主传播。

三、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新时代践行文化主体性的路径选择

当下，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东弱”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概念、方法进行话语生产，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不仅侵蚀了自主话语的独立性，更暴露出话语体系建设中文化主体性缺失等深层次问题。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解决挨骂问题关键应着力构建与国力、国情匹配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植根本土文化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形成内嵌于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亮出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底色，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文化资源，面对世界不断提升学术转换和文化创新能力，就成为全力探寻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的可行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发展文化主体性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

^① 参见牛月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试探》，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起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内容载体。这决定发展文化主体性话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一是增强文化主体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发展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文化主体性话语作为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话语形态，是文化主体性的外显表达，有一个传递什么和怎么传递的问题。只有坚守住意识形态底线，语言才能在不忘本中说新话，在融通中外、连缀古今中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意识形态面临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前所未有，加强文化主体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紧迫。一方面应关注文化主体性话语内容生产，使其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深耕内容，尤其要以通俗化、大众化表达形式增强语言温度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应强化党对文化主体性话语的领导，加强党在推进文化主体性话语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规范等刚性约束将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落实到文化主体性话语内涵式建设过程中，明确各项工作的重点和目标，赋予文化主体性话语更多中国特色。

二是要提升文化主体性话语的阐释功能。阐释功能旨在为文化主体性话语提供价值澄清和语言整合力量，任何语言想要达到一定目的，都要提升自身的阐释力。语言的阐释功能分为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显性功能是指语言生产的程序化活动，用于检视语言活动的结构空间，修正语言规范。隐性功能是指语言生产的价值先在性，着重体现在为个体营造价值预设，使其在长时空里形成一种基于整体意义上持续性价值判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厚滋养，实现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传统文化价值、精神特质融会贯通。因此，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应着力提升文化主体性话语的阐释功能，一方面，要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价值追求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马克思主义框架观照下的传统文化认识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的统一。另一方面，应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使得肇始于“农业文明”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积极接轨，以现代社会的进步性、包容性和批判性认识传统文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扬弃，将其塑造为中国人认识事物、指导实践的精神力量。

（二）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今天的中国就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肯定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树立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①。把握文明发展的延续性，并自觉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党的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

一是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②。中华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与魂。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核心理念，核心理念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高度凝结，是经过历史检验和实践比较中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基本理念。核心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理念，进一步挖掘、学好、用好这些理念对于形成具有浓郁民族气质的语言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想……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③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二是充分彰显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主体依据某种形式理解、把握和评价思维客体的过程。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结构，从而影响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进而形塑具有特定民族形态的语言形式。思维方式对任何主体的思维活动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以农业为基础，故质朴厚重，绵延世泽，以宗法家庭为社会结构的柱石，故尊祖宗、尚人伦、重情感^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等特征，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就特别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将天地万物运动规律勾画为一个可以相互转换、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生成图式。

构建文化主体性话语应积极借鉴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方面的思维模式和样式，充分把握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从文化演变规律、战略和道德生活价值等层面进行阐释和论证，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注入新的活力。

（三）面向世界增强文化主体性话语魅力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主精神，它是在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在面向世界中强化认同，在多元文明碰撞中增进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冷战思维和国际资本逻辑驱使，发达国家在全球大力推行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念，“文明冲突”“历史终结”“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不绝于耳，文化霸权霸道霸凌大行其道。面对西方文化渗透，构建一种致力于消解文化交流障碍，弘扬民族文化的话语体系就尤为重要。文化主体性话语应积极面向世界，在传承和创新自身文化基础上有效增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用丰富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展现神形兼备的文化“自我”。

一是要进一步凝练文化主体性话语概念。概念是连接理论与现实的桥梁，是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没有概念人们便无法准确传递信息。文化作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具有地方性特征，任何文化形式的生产和传播都有其地方背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认为的，文化是“一个

^① 参见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①，本土历史和实践是文化概念的来源。文化主体性话语是立足于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话语实践，是对文化主体性进行自主构建的语言活动，它既要体现文化主体性意识又要表达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文化主体性话语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本土案例研究，深入把握当代社会发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发掘和研究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规律，在比较和借鉴西方话语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彰显民族特色、具有一定显示度的文化主体性概念体系，推动学术研究由“引进—消化—吸收”转向“创造—输出”。

二是积极推进学术交流，增进文明互鉴对话。增强文化主体性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关键是要促进核心概念的传播，只有通过学术交流和学术锻造，核心概念包含的知识图谱和价值理念才能为受众接受。首先，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应围绕受众需求，深化内容供给，既要通过严谨的学术交锋，不断弘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谐性、责任观等价值理念，也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增强学术表达的生动化、通俗化叙事，不断聚焦典型案例研究，依托个体奋斗经历、家庭成长轨迹、社区发展变化等具象化内容，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融入国际受众熟悉的生活语境。其次，要增强学术共识交流，推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叙事研究，在比较分析中，彰显中华文化应对现代化危机的实践伟力。最后，应强化多方联动，提升学术传播合力，积极发挥政府在信息共享和资源整的显著优势，完善媒体在内容生产和议题引导中的中枢作用，搭建政府、媒体、科研院校深度协作机制，围绕“两个结合”，“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核心理念，形成同频共振的联动格局，集中多方力量，破除西方对中华文化、中国发展道路的固有偏见。

（罗家旺系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汪世锦]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